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一、“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国破家亡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有意破坏，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侵占中国东北的事件。这一事件的爆发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侵略中国的既定政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大步骤。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在中国东北获取各种权益。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它曾迫使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才又被迫以索取三千万两“赎辽费”的补偿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通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它取代了沙俄,把黑手伸进了中国的东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再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提出了所谓“满蒙积极政策”,臭名昭著的田中义一奏折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根据这一国策,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进行了首先侵占整个东北的策划和准备。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都遭受了严重打击，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中国的侵略。1928 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1930 年 9 月 18 日发出巧电，表示拥护蒋介石，呼吁和平统一。日本帝国主义因畏惧中国和平统一妨碍其侵略野心，更是加快了侵占“满蒙”的步伐。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英美等国正忙于应付国内经济危机而无暇东顾，蒋介石集团把精力用于内争而难顾外患，张学良因助蒋打内战而将东北军主力开入关内，便认定这是实现其首先侵占东北，进而独占中国的侵略计划的好时机，于是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虽然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早已路人皆知，但是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安内’剿共’作为其头等大事,而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的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它公开宣称要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其东北驻军的调动和军事演习更加频繁，为了伺机寻衅，日军已在东北制造了多起事端，6 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7 月演出了‘中村事件’。面对这种紧张形势,蒋介石不仅不加强戒备,反而在 8月 16 日向张学良发出铣电说：“无论日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蒋介石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南京政府号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②。这种不抵抗政策的后果是十几万东北军一枪不发仓皇退入关内，东北从此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即公开表明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立场，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战，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这些宣言义正辞严

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第 24 页。
②《从‘九一八’到‘七七”》,苏南新华书店印行。

地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指示各级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动员群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让广大党员正确认识‘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明确党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宣言和决议,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使全国人民在国民党推行不抵抗政策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抗日热情得到了激发与鼓励。尤其是丧失了家乡的东北人民，更是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复土还乡的希望，增强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我国东北以后，东北人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的斗争。1928年日本加紧侵略中国之后，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随之更加激烈。反日活动日益扩大而深入。如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其组织遍布于东北各大城市，且推展到各县(仅辽宁省即有41个县设有国民外交协会分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有力地支援了东北地方政府对日的多次交涉。又如阎宝航、车向忱等在辽宁成立了国民常识促进会，参加工作的有张希尧、张金辉、王牺忱、宋黎等数十人,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利用寒暑假期，组织学生深入全省各地宣传，成立大众国货商店，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辽宁还成立了拒毒联合会,经常调查、揭露日本在东北各地开设烟馆、贩卖毒品的毒华政策，没收了日人从瑞士及德国偷运到东北的价值百万元的海洛因等毒品。上述反日团体还和辽宁省商会、农会、教育会等法团一起开展了反对日本铺设安(东)奉(天)铁路双轨,修建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双轨的斗争 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内的教育权的斗争,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日本在东北各县所设警察所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促进了东北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为后来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的建立和义勇军的兴起都作了思想、组织及群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九一八”的炮火更是激起了东北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总爆发，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又是他们及时奋起，挺身而出，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仅用三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接着又于次年 2 月 9 日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数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家庭妻离子散，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国破了，家亡了，不甘愿做奴隶的东北人民希望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要求张学良发兵逐倭，帮助他们复土还乡。但国民党政府的答复是：“不让东北事件扩大，要看成地方事件。”听候国联制裁云云。张学良也不得不表示听命于中央。人们失望了，他们认识到，不能依靠当权者，只有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共赴国难，抵抗日寇，才是东北人民的生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北人民组织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诞生了。

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国难家仇所激愤的东北流亡群众很快地组织起了各种救亡团体，其中最大的有三个：一是“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1931 年 9 月 21 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系被迫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和原在北平读书的东北籍学生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二是“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9 月 25 日在奉天会馆成立，推举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兼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王化一为会长，参加者有东北各界人士及青年学生。三是“抗日救国会”，起初秘密成立于沟帮子，继迁于锦西，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陈先舟、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沈阳公安局督察长熊飞等人串联组织。在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张学良出兵抗日的希望破灭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救亡主张的鼓励下，大家都感到有加强联合，建立统一的民众抗日团体以推动抗日斗争

的必要。1931年9月23日,王化一邀请了高崇民、阎宝航(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陈先舟、卢广绩(辽宁省工会联合会会长,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等人商议,决定将上述三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随即，他们便分头串联，得到了三个团体领导人、东北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广泛响应与支持。由于经费缺乏，北平市公安局长鲍毓麟、北宁铁路局局长高纪毅各捐款200元做开办费。1931年9月27日，400多位东北流亡同胞聚集在位于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内，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做为群众自己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光荣职责。

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召开,大会产生了“救国会”的组织机构。大会规定“会员大会为‘救国会’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选举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陈先舟、车向忱、金哲忱、彭振国、熊飞、黄显声、李梦醒、孙一民、韦锡久、梅佛光、黄剑秋、钱公来、杨士光、韩立如、郑奠邦、谷秀岩、卞宗孟、顾翌棠、苏上达、吴焕章、霍维周、王捷侠、王兴东、林耀山、张希尧等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21日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推选出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彭振国、熊飞、霍维周、杜重远、李梦醒九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为“救国会”的领导机关，常委会下设总务、军事、宣传三个组,各设正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均由常务委员兼任。总务组负责筹划捐款、分配救济物资和前方军需等工作，正副组长为卢广绩、高崇民；军事组负责军事，如组建义勇军和指导其抗日武装斗争等,正副组长为王化一、彭振国、熊飞;宣传组负责抗日宣传，包括出关人员的政治训练等，正副组长为阎宝航、杜重远(杜在上海未到任,后推霍维周继任)。以后以上三个组又分别改为秘书处(原总务组任务不变,新增加负责接待各方来“救国会”的代表及处理本会日常事务等工作)、军事部、宣传部(后又改名为政治部,部内增设“关外工作指导委员会”,由阎宝航兼任委员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并增设了调查部,调查部先由梅佛光负责,后由李梦醒负责。此外,“救国会”还设有监察委员会和特种委员会(如军事及政治委员会)。各部及委员会分别配有若干秘书和政治工作人员,计有徐仲航、朱焕阶、胡石如、邹希孟、张松筠、陈凤生、张惠民、刘世光、耿秉文、佟明高、赵常泰、郑鸿儒、黄宇宙、张希尧、张雅轩、张金辉、张心一、冯基平、张一吼、杨寿天、张俊波、高鹏、马洪德、赵孟仁、崔永、杜芳圃、纪亭榭、李文美、于锡猷、李东藩、王达夫、吕济卿、刘占华、董政之、徐春普(女)、姚瑞芳(女)、张介仁、张纳夫、赵世光、韩慕贤、孙廷荣、郭玉潘、何承斌、张金英、李海青、周铁南、张恨愚、张滋霖、姚明顺、孙申书、王少飞、朱香九、李飞、苗可秀、赵成国、于世琛、隋春霖、郑杰、华春琛、孙国璋、宁匡烈、宋黎、李烈生(李兆鳞)、潘赓祺、魏兴华、石天倪、李春林、郝玉春、郑洪轩、徐明德、夏汝梅、江涛、李全林、杨成璋、宋正大、虞子白、汤成铭、葛洪文、叶定海等数十余人。这些人多被分派到东北各地从事各种抗日宣传和联络组建义勇军的工作。

除了北平的总会以外,“救国会”的组织还发展到了日寇铁蹄下的东北地区,尤其在辽宁省最为广泛。如 1932 年初,“救国会”派黄宇宙到桓仁和唐聚伍等商量成立了“辽宁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即“救国会”辽宁省分会。“救国会”在辽宁还设有奉天、庄河总部,西丰支部等,赵殿良等人在沈阳也组织了“救国会”分会,辽宁东边道的许多县,如辑安、宽甸、安东、凤城等地都成立了“救国会”分会,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此外,“救国会”在哈尔滨也设有总部。

“救国会”成员的出身、政治信仰、社会地位虽然各不相同,但复上还乡、抵抗侵略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成立大会规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该会宗旨,为此,“救国会”自始至终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1931 年 9 月 28 日,即成立的第二天,“救国会”发表了由秘书胡石如起草的成立宣

言①,详细阐述了该会成立的目的、纲领和任务。

《宣言》首先痛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我房屋、劫掠我财产",并于事变后,步步紧逼","易帜设官,进兵吉长、既据我辽吉、复窥我黑哈"的野蛮侵略暴行,愤怒疾呼","咄彼倭奴,欺我太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一步步地实施吞并全中国的侵略计划,要全国人民警醒,指出,"吾人回忆过去日人对东北之设施,无一非亡我之工具,所谓满蒙积极政策,殆为其全国上下公认不讳之事,盖欲完成其大陆发展计划,侵略东北,实为其吞并朝鲜唯一之工作。"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目的,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

《宣言》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助长敌人"睥睨一切,毫无顾忌",指出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武力抵抗"以与倭奴决一雌雄"。"为主持正义而战,为保卫和平而战","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定"进行最后之一战。

《宣言》最后号召全国同胞,为保卫与收复"我祖我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之繁荣"的神圣国土东北,要"速起自救",表示"本会甚愿追随全国同胞之后,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他,时机迫切,急不择言,凡我同胞,曷兴乎来。"

"救国会"是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群众团体,又是一个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救国会"的成员,从地域关系上看,主要是流亡关内或在关内服务、求学的东北籍人士,但不仅限于此,"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的决定明确规定"入会条件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有国家理想者,为进行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从社会职业来看,原辽宁省及沈阳市各法团(如基督教青年会、工会、商会、农会、平民教育促进会

①陈觉:《国难痛史》第3卷第8章,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9月出版。

等)和反日群众团体(如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联合会）的领导人占少数，但起着核心领导作用，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东北军政当局中力主抗日的高中级军官也占一定比例。从党派关系来看,大多数是无党派人士,此外,国民党、青年党及共产党均有人参加。属于国民党的主要有梅公任(又名梅佛光)、吴焕章、黄剑秋,及“改组派”钱公来,属于青年党的有王捷侠、霍维周、赵桐、苗可秀、高鹏、纪廷榭等参加“救国会”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党影响下思想进步的青年主要有张希尧、宁匡烈、郑洪轩、冯基平、石天倪、张雅轩(张金辉)、宋黎、赵常泰、韩天佑、王大增、夏汝梅、董学礼等。“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车向忱等在当时都属于无党无派人士。由于大家都有“救国高于一切”“家乡都丢了,逃到关内只有“共同对敌”的共识,总的说来,“救国会”的成员能够不分阶级、信仰、党派,团结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影响了“救国会”，“救国会”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在组织上,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在“救国会”中起着骨干作用，各项具体工作多由他们承担,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对“救国会”给予了一定的指导和帮助。“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深,大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国共产党，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如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杜重远、车向忱等)加入了共产党或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甚至也有一部分青年党人（如高鹏、纪亭榭）通过“救国会”的一段经历也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加入了共产党。

“救国会”的成立,首先受到了广大东北人民的欢迎。东北各界爱国人士不分民族、阶级、党派和政治信仰,都衷心拥护、热烈支持和积极参加了该会组织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东北流亡青年,悲愤于国土沦丧,家乡被蹂躏,更是积极参加“救国会”的工作，

其中相当部分人都曾冒险出关，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东北人民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全国同胞是他们坚强的后盾。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当时关内许多舆论对“救国会”的成立及活动都给予了正面报道和宣传。如上海《民国日报》在1931年10月20日报道说“:自倭陷辽吉、东北志士纷纷脱险萃于北平，纠集同志共挽危难，爰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对于‘救国会”组织的‘南京请愿”;北平《实报》曾在《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为题的报道中给予高度评价，其它报刊也作了报道与宣传。对于“救国会”在关内举行的抗日宣传活动和其它抗日救国活动，关内人民也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在听了‘救国会’的抗日宣传后,当即‘有青年起来组织抗日运动者。’①“救国会’组织的‘南方请愿”,关内人民不仅大力协助和支持，一些青年学生还亲自参加，如天津学生就同时组织了请愿团予以助威。关内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还积极募捐,认购‘救国会’发行的爱国奖券,以解决‘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如当时十九路军全体官兵曾发起每月向‘救国会’捐献薪金百分之一的运动“;义声所播,一时各方公务员闻风感奋,竞起仿行。’②“救国会’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市民也积极购买。除张学良和一些东北籍的上层人士对“救国会”给予了经济援助外,国内其他一些上层爱国人士也对‘救国会’解囊相助，如旧官僚熊希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弟、八道壕煤矿局局长王正铺等人都向“救国会”捐助了数目不小的经费。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抗日救国旗帜，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关内外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①杜重远：《狱中杂感》
②《救国旬刊》1932年11月30日第28期。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主要活动

根据“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的宗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面临着两大主要任务：一是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期唤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我国领土的侵略；二是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同日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谋收复失地,复土还乡。因此“救国会”成立后,即以宣传工作及军事工作为中心展开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

一、反对日军操纵下的东北各省汉奸的“独立”

早在 9 月 28 日发表的成立宣言中“救国会”就揭露了“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的阴谋。此后，在 1931 年 10 月至 1932 年 2 月“救国会”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和国民政府发出电函,要求肃清汉奸、卖国贼,不承认各种伪组织,明确表示救国会不承认这些伪政府，对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甘为傀儡的汉奸定要缉拿归案,严惩不贷。同时,救国会还直接致函和发表宣言,对一些汉奸头目发出了警告和声讨，号召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捕杀汉奸,以正国法。9 月 24 日,日本关东军策划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袁金铠任委员长,李友兰、于冲汉为副委员长,佟兆元等为委员。对此,10 月 4 日救国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张学良及各院长、各部长、各省主席、各市长等,郑重声明：日军一手扶植的伪“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是“欲假此御用机关,以施其掩饰侵略之阴谋”;“吾人固不敢将彼等一概认为汉奸卖国之徒，然其中实不免有甘心为虎作伥，被人利用者，本会尊重主权起见，对该会一切设施及与日方所订任何条件，决不承认。”同时,又致函袁金铠、于冲汉等人,警告他们,不要“甘当傀儡”;“认贼作父”,否则群情激愤,尔等死期至矣。原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九一八”后卖国投敌,组建了伪政府——“吉林省长官

公署”，10 月 6 日，救国会直接写信给他，向他发出了严重警告，信中说“为此倭寇压境，东北沦亡之际，自应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以御外侮。奈何乘此危亡，卖国求荣。在先生地方念重，或欲藉此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市面安定，用意固属可嘉。庸讵知日人野心勃勃正拟乘此时机，利用汉奸，纵恿东北独立，以遂其吞并满蒙之政策，明达如公岂复鉴不及此，纵使迫于淫威，力不能抗，胡不超然远引，或杀身以成仁。今乃低首下心，甘为傀儡，其将何辞以谢国人，何颜以面关东父老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勒马悬崖尚未为晚’。请即拒绝日方伪命，取消伪省署，以免为虎作伥，倘利令智昏，甘冒不韪，则群情激昂，民意可畏，幸勿谓博浪无锥，荆轲无剑也。”[①]10 月 20 日，救国会致电国民党政府，对赵欣伯充任伪沈阳市长一事提出了处置意见，指出“对此等奸贼，如不悬首高竿，何足以伸国法，而肃纲纪”，请政府即日明令通缉，就地枪决，以除后患，而戒其余”。10 月 26 日，救国会致电东北各政府机关，提出“东省不幸，惨遭倭祸，日军所至，田庐为墟，稍具血气，莫不悲愤，乃竟有不知国耻之徒，乘此变乱，组织各种机关，阳借维持治安之名，阴行谋夺政权之实，早为一般人所不齿，本会曾发有最重要警告，促其觉悟。近据报载，倭奴复作进一步之工作，公然利用汉奸，组织东北伪政府，作宰割国人之工具”。“兹特郑重申告，此种机关，本会誓不承认，并宣告国际，揭破日本阴谋，各县政府或所属局处，倘对于此种倭奴制造之伪政府，加以拥戴，或将收入解国库省库之各款解往伪政府者，本会即认为汉奸卖国，决采有效办法，予以最严厉之惩处”[②]。1931 年 11 月 18 日，在得日寇利用溥仪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后，救国会发表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申讨溥仪宣言》，全文如下：

日本帝国主义者乘中国空前水灾，世界各国经济恐慌之际，突于九月十八日，以军队袭取我沈阳，继复进炸我辽、吉两省之重要

① 陈觉：《国难痛史》第 3 卷第 8 章，第 36—37 页。
②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城市。两月以来，置国联两次限期撤兵之决议于不顾，一方使事体扩大，以飞机轰炸我锦县，以重兵攻取我黑龙江省城；一方勾煽蛊惑，冀以完成其所谓树立满蒙新政权之计划。前者，日本浪人土肥原翩然莅津,吾人固已了然其用意之所在。果也,土肥原莅津未久，而日人包庇暴徒，扰乱天津之事件发生；而亡清废帝溥仪为之挟持以去，而溥仪在沈复辟之消息轰传遐迩。夫复辟运动，张勋以督军团领袖之地位，称兵作乱，曾不获销逞于万一；今仍在日寇占领区域之内,计日实现,其为狡日阴谋,固已昭然若揭。此其所为,实破坏我国行政权之完整，摧毁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公约之精神。国民一息尚存,如维护国际公约、人类和平、履行其对世界人类之义务,自应誓死反对,以热血头颅与暴日相周旋。惟是,吾人以东北民众之立场，有不能不郑重声明者；日本之处心积虑，无日不思在东北树立一中国人组织之傀儡政府，供其驱使，谋之已久,筹之已熟,顷伪廷虽未正式成立,确已在积极进行中。在日军撤退之前,依吾人良知之所昭示,必将于最近期内立告实现,于是,将来仍以伪廷为交涉对手，于我东北之主权任意割取；犹以民族自决之美名炫然欺朦世界之耳目。其计而果行也，则我国之东北势将浸假沦为今日之朝鲜第二，为祸之烈，实为吾人所不忍言者。夫东北三省,为东北民众财产庐墓之所在,溥仪何人,而能任意断送,秽寇何人，而能肆意攘夺？矧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所有颠覆国体之企图,举为国家法律所不许。溥仪何人,而敢受人利用,甘冒不韪，颠覆国体,认贼作父,是纯然内乱罪之正犯,我国公敌。其对内对外之一切行动，如发布伪命，签订条约等非法行为，吾东北三千万民众,虽粉身碎首,亦不承认。彻终彻始,此志不渝。尚望全国同胞政府诸彦,急起奋斗,一致主张。请政府对溥仪伪廷,明令申讨,痛加挞伐,吾东北民众,誓从全国贤豪之后,为政府后盾。东北沦亡,间不容发,挽澜赴义,不容反顾。迫切陈词,敬希亮察。①

①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救国会”的上述通电、信函和宣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镇慑作用，许多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名利之间犹豫观望者如辽宁的李友兰、佟兆元、穆春、于珍、马龙潭等都没有接受伪职。同时，它仍还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心与决心。

二、安置流亡难民，培养抗日骨干

“九一八”事变后，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志士逃亡关内，尤以青年学生居多，人数达近万人，安置这些流亡难民是“救国会”的当务之急。为了安置抗日人员的眷属及流亡关内一时无法谋生的东北人民，“救国会”设立了收容机关，名曰“东北难民教养院”，地址在郁文大学旧址，最多时收容达四五百人。“教养院”还办有手工工厂、小学校、幼儿园等。“教养院”由卢广绩任院长，侯敬民全面负责院务。卢广绩出国后由车向忱接任院长。“救国会”还设立昭义祠，以表彰为国捐躯的抗日烈士，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对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救国会”把收容安置他们与培养抗日骨干的工作结合起来。“救国会”成立不久就建立了东北学院(后改为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收容流亡学生，由王化一、李梦醒分别担任校长。随后又帮助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收容东北大学学生。东北大学是东北培养各方面人材的最高学府，于 1923 年 4 月 26 日正式建校，1928 年 7 月，张学良任该校校长。至 1929 年该校初具规模，学生达一千二百余人。东大距北大营不远，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许多师生入关避难。学校旋在北平借奉天会馆设东北大学办事处，收容学生，一面分送学生到平津各大学借读，一面筹借校舍以便复校。10 月 18 日，东大于北平南兵马税务司监督署重新开学，借读生也返校复课。1932 年 2 月，又借得北平师范大学广安门大街校舍，适东北交通大学 150 多名学生由锦州逃往北平，东大便增设交通学院将其收容。

张学良利用东北大学抵抗侵略、自强雪耻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1933 年 4 月，他在热河失陷被迫下野前夕和幕僚密议“还乡大计”时，提出武要保全东北军的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说开办东

北大学“当初的目的在培养实用人材,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而消弥邻邦的野心，谁知变起仓促，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注意。即不徒怨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要训练东北青年知耻自强,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这样方可达复土还乡之目的”①。

“九一八”事变后,深受抗日爱国思想熏陶的东北大学学生对于国难家仇，义愤填膺。流亡北平后，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了抗日活动。1931 年 9 月 21 日,东北大学学生和其它东北学生,集中于北平大学法学院，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会上成立了“法学院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和敢死队，大会通电国民党政府的各级党政机关,要求“自息内争,一致对外……倘再有执迷不悟,自私自利者,即认为全国公敌”。

法学院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的成立，推动了东北其它学生爱国团体的成立。紧随其后，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朝阳大学东北同乡抗日救国会、民国学院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同乡抗日救国会等组织相继成立。这些爱国团体纷纷致电、致函张学良和国民党政府，要求出兵抗日，表示誓死收复失地，要求成立辽吉黑抗敌政府，否认伪政权，通缉附逆汉奸；并通电向东北义勇军致敬,表示誓做后盾 为了保家卫国,任做枪下鬼,不做亡国奴 爱国的青年学生到张学良处请缨杀敌的每天都有数起，要求抗日救国之情极为迫切。

鉴于东北大学学生为代表的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救国会”把青年学生作为培训抗日骨干的重点。“救国会”建立之初,就组织青年集中训练,每期二、三个月,毕业后送他们出关参加抗日义勇军及进行其它抗日活动。1931 年 11 月“救国会”在北平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组织了东北学生军，这是其集中组织训练的

①《“九一八”前的东北大学》,《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 1 辑。

第一批东北青年，共有二三百青年学生，由张希尧负责（张后来生病改由苗可秀负责）。“救国会”对学生军的训练主要是军事训练。教员是平薪聘请，有的更是不要分文。学生军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受到的训练相当严格。吃的是粗粮，睡的是地板，每天清早就起床跑步，白天出军事操，上国术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技术，钻研制作炸弹的方法、爆破技术等。“救国会”一些负责人以及“救国会”请的一些社会名流还经常对学生军进行抗日爱国思想的教育。学生军在接受教育后又组织小型宣传队走上街头、学校，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这批学生军后来大多潜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救国会”还从东北青年学生中抽调骨干，造就政治工作人才派往东北义勇军工作。这种训练班断断续续办到 1933 年 10 月。

“救国会”组织训练的抗日骨干，在组织联络义勇军等抗日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大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宣传工作是“救国会”的重点工作之一。“救国会”成立后就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工作。它一方面在北平组织东北流亡青年成立宣传队，沿平津、平汉等线，向附近城镇和村庄的人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诉说东北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号召各界人民为东北义勇军捐款，以实际行动支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又派出车向忱、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等主要负责干部分赴南京、上海、广州、福建、江苏、浙江等地，揭露日本侵略的真相，以唤起全国人民起来抵抗侵略。

1931 年 10 月初，车向忱带领一个宣传组先是前往山海关、绥中、兴城等地进行宣传，随后又去南京。在南京他们参加了各界抗日救国活动，要求国民党中央及时声明“对日最后方针”。

“救国会”政治部长阎宝航利用自己在辽宁省青年会工作时与南京、上海各界人士的交往，在这两地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会、座谈会等，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曾应上海市商会和教育界救国联合会的邀请，到市商会议事厅去演讲。在演讲中他批评当

地政府‘事前不加防范,事后又抱不抵抗主义,以致失地千里,不堪收拾…… 坚决主张‘拒绝直接交涉,赔偿我万损失,树立我国东北之根本安全”。号召各界人民‘一致对外,彻底经济绝交,以及厉行军事训练等”[①]。两千多听众深受感动。

“救国会”执行委员,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曾在上海与其他爱国人士一道发动群众,为抗日将士募捐和进行抗日宣传。从1931年冬到1932年春,他还在长江流域的湘、鄂、川、赣、宁等省市进行了几十次演讲,每次听众达千余人。他的演讲“不仅极其感人肺腑,而且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如在江西九江的某中学演讲后,当即“有青年起而组织抗日运动者”[②]。

北平、天津是‘救国会’重点宣传地区。“救国会”派出王化一、徐靖远、张希尧等人到各大学“救国会”还请到北平的义勇军将领给青年们介绍他们在东北艰苦奋战的事迹,极大地激励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向救国会要求出关参加义勇军。

为了更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从1932年起“救国会”创办了《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与《东方快报》等报刊,系统地报道东北义勇军的战况,阐发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批驳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号召东北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而奋斗到底。

此外,为了发动关外人民抗日“救国会”还于1931年11月,由郑洪轩、刘少华等组成的宣传小组去大虎山、沟帮子、黑山、北镇等地,直接向关外人民宣传抗日。

“救国会”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唤起了关内外人民的民族危机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

四、组织赴上海、南京请愿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月4日。
②杜重远:《狱中杂感》。

高潮。工农商学兵各阶层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以通电、集会、罢工、游行示威和请愿等形式,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东北流亡学生情绪尤为激昂,与各界群众在会馆愤怒集会,一致要求组织到南京请愿。当时国民党宁粤两派正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上海、广东各界提议东北民众前往参加,以督促国民党停止党派之争,一致对外。

为顺应广大学生的爱国要求,配合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10月28日,救国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由东北逃难至北平之各大学学生及旅平之东北各民众团体,联合组织“东北救国请愿团”到上海、南京请愿,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请愿团由冯庸作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另设指挥9人,队员620人,每队设队长1人,队下设组,各设组长1人,以严守纪律,互相约束。拟定并发布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痛陈了日本侵略者暴行及其给东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自九月十八日夜起,一昼夜间,国家顿失东北数十名城,无辜民众被枪杀,国家军队被缴械,财产劫毁,公私荡然,土地人民主权,悉受蹂躏,为国际间未有之惨变,国家空前之奇辱。”《宣言》对国民党热衷于党争,以致于上海和平会议迟迟没有进展表示强烈的不满,强调指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凡属国人,稍具血性,无不悲愤。宜如何努力奋斗,团结对外,共挽劫运,雪我国耻。况为党国领袖,政治当局,逢此噩运,更宜牺牲一切政见,竭诚合作。不谓国势危殆至此,而全国民众所属望之上海和议,一则曰交换意见,再则曰预备会议,蹉跎岁月,无补时艰,尔诈我虞,毫无诚心,固执私见,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利令智昏,视东北惨变如无闻;一若派之利益高出一切,国可亡,而派之利益不能不维持,国虽亡,而派仍能独存者,夫领袖结合,尚如此困难,亟于全国团结,全国总动员,更何能望?是吾东北土地将沦于万劫不复,而吾中华民族,亦将同归于尽矣?”针对国民党政府不作实力准备,一意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出面干涉,压迫日本撤兵的外交政策,《宣言》也用种种事实,提出国联不可靠:“夫国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